

# 受诅咒的命运？

——从自由公共领域到数字公共领域

汪行福<sup>a,b</sup>

(复旦大学 a.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b.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西方世界自18世纪以来,公共领域经历了自由公共领域、有组织的公共领域和数字化公共领域的三次转型,今天正处在数字公共领域阶段。如何看待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包容与商谈的关系可以作为理论的坐标。以参与者的包容的普遍性和意见形式的说理性特征来衡量,自由的公共领域具有较强的说理性,但具有精英主义特征,劳动者和妇女被排斥在外,议题被限制在财产权和人权范围,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性质。在组织化的公共领域中,国家和组织取代了个人成为公共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公共舆论和意见被自上而下地控制和操纵,民众虽然在法律上被赋予了参与的权利,但实际上却被剥夺了发挥作用的机会,因而它是一个弱包容和强控制的公共领域。数字公共领域时代,虽然更多的人被赋予了自我表达的机会和手段,但公共领域日益陷入了分裂和冲突,成为非理性情感和欲望表演的空间,因而是一个强包容和弱商谈的公共领域。如果说,包容性与商谈性的统一是公共领域的理想,从自由公共领域到数字公共领域的演变是否表明:公共领域参与空间的扩大必然带来其质量和品质的下降?这是我们时代面对的难题。

**关键词:**自由公共领域;组织公共领域;数字公共领域;现代性;哈贝马斯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4)03-0028-10

## 一、公共领域问题及其研究范式

“公共领域”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按照历史学家盖尔纳和朗西曼的观点,文明社会依赖于三种社会基本功能,即以犁为代表的生产方式,以剑为代表的强制方式和以书为代表的说服方式。三者的地位和关系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历史的坐标。加汉姆说:“从人类历史时

代开始,纵观人类学的研究记录范围,说服模式与强制模式和生产模式的关系是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变更和进化形式的核心问题。但这些问题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领域和社会角色的日益差异化,以及关于标准和角色的反身性的日益普遍化,说服模式必然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具有推论性质的社会调节任务。”<sup>[1]270</sup>这种推论性质的说服方式正是公共领域的特征,因此,对

**作者简介:**汪行福,复旦大学教授,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现代性和社会批判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013)

它的历史形态的演变及其特征的研究,对我们理解时代的风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世界失去了曾经依靠的规范基础,“它只能在自身内部寻找规范”<sup>[2]</sup>。现代性意味着主体性的觉醒,规范和价值的自我证成成了时代的根本任务。这种从主体性原则出发的反思和批判意识,推动着生活世界的合理性。18世纪西欧出现了公共领域,公民不仅在私人生活中进行自我定向,而且对社会政治秩序和集体同一体的规范和价值进行讨论,在此背景下,不仅出现了新的合法性原则,而且出现了公共舆论和意见形成的新的机制。公共领域概念在西方政治哲学和社会领域中极其重要。“近些年来,无论是在政治理论内部还是在传媒及其政治角色的思考中,我们都目睹了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的一种批判,以及向启蒙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的一种回归。这种回归关注的是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公民身份和认同这些概念。”<sup>[1]273</sup>这里所说的回归启蒙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是回归康德式的公共理性观念。而在这一回归中,哈贝马斯起到重要作用。

哈贝马斯说:“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不仅需要法治国家机制的保障,它也依赖于文化传统和社会化模式的合拍,倚赖于习惯自由的民众的政治文化。”<sup>[3]29</sup>对公共领域问题的理论兴趣在根本意义上是对民主的兴趣。公共领域理论有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它指向一种公共理性的理想。按照康德的理解,公共理性是相对于私人理性而言的,它要求把他人的判断考虑在内,以他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思考。康德的“共感”理念可以用于阐述这一公共理性概念。共感是一种通过相互参照来获得客观认识的评判能力,“这种评判能力在自己的反思中(先验地)考虑任何他人在思想中的表象方式,以便使自己的判断仿佛是依凭全部人类理性,并由此避开那会从主观的私人条件出发对判断产生不利影响的幻觉,这些私人条件很容易会被认为是客观的”<sup>[4]</sup>。这种走出自

身,“站在别人的地位上思考”,康德称为“开阔的思维方式”准则,它与“自己思维”的启蒙准则和“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的一致性准则一起构成健全思维的准则。阿伦特把“站在别人的地位上思维”或“置身于他人的位置”称为“放大的思维”,与这种思维相独立的是狭隘的思维,它不涉及思维能力,只涉及思维方式,一个人的思维的自然能力无论多么小,如果他能够自觉地置身于“普遍他者”的位置,并从普遍的立场对自己的判断加以反思的话,他就具有“开阔”的思维方式。当然,在康德那里,这种“放大的思维”是由思维者通过想象力在自己意识领域中实现的,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作为公共理性的规范理想看待,并通过公共领域概念赋予其制度性意义。第一,公共理性是一种规范的理想,一种开放、包容和批判的态度。当我们从这一公共理性理想出发来设想公共舆论和意见的形成机制时,就赋予了公共领域概念以规范和理想化的意义。第二,公共领域又是一个社会领域。作为一个社会空间,公共领域指向那些让人们可以自由表达和讨论的社会空间,以及与它相联系的法律和社会制度。在此意义上,公共领域概念是一种社会学和历史概念。

“公共领域”概念的流行得益于哈贝马斯。哈贝马斯一直关心公共领域的转型及其政治影响,他说:“公共领域作为相互之间理性交往的空间,是我一生都在关注的主题。”<sup>[5]</sup>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公共领域有两个核心规范:一为包容,即公共决策的形成要求把受影响的成员都被纳入其中,赋予他们同等参与的权利;二为商谈,即法律和公共政策不应该由权力主宰,而应诉诸商谈性公共理性共识。在此,包容性是公共领域的社会空间特征,商谈性是公共领域的话语内容的理性特征。

公共领域的研究有许多范式。以行为主体为中心,可以区分出以传媒生产者为中心的研究和以受众为中心的研究;从公共领域的作用来考察,可以分为社会功能主义研究和意识

形态批判,社会功能主义关注的是公共传媒对个体态度和社会意识塑造的经验效果,意识形态批判意在揭露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霸权意图和压迫性特征。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判理论传统区别于上述两种研究,它可以理解为一种带着规范意图的社会理论。就公共领域的研究而言,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张力。首先,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合理性潜能理想,以公共理性而不是权力强制来实现社会整合,代表着新的合法意识的出现,因此,我们需要维护公共领域的理想;在利益冲突和权力不平等条件下,公共理性有可能被扭曲或意识形态化,因而需要进行批判的研究。就此而言,我们既要反对经验的实证主义取向,也要避免脱离现实的规范主义幻想。其次,公共领域的交往区别于私人领域的交往,它是以传媒为中介的,既影响公共舆论的既有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也有公共媒体形式和它的技术特征。因此,公共领域的研究既需要进行社会分析,也需要进行技术分析。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可以建构一个公共领域的研究范式,在这里,包容性和商谈性是规范性评价的两个向度,社会分析和技术分析是经验研究的双重视角。

西方社会公共领域经历了一系列转型和变化,这些转型可以置于现代性的大背景中来考察。借用瓦格纳对现代性的历史分期,它可分为三个阶段或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受限的自由现代性”,即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该现代性的特征是少数精英已摆脱了传统的束缚,能够以反思和批判的方式对待既有的规范,但大众被认为没有反思和批判能力,因而应该受到他们的支配。第二种是“组织化的现代性”。以强国家为特征的社会秩序,群众被划分为不同的社会范畴,并被组织在严格管理的系统之中,“结果,有组织的现代性概念突出了集体的权利,而非个人的权利。有组织的现代性把群众包括在内,然而,并没有赋予他们自由主义现代性曾经赋予资产阶级的少数人

那样的个人权利”<sup>[6]27</sup>。这一现代性也就是20世纪初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第三种是多元主义时代的现代性。“在20世纪后半叶,以国家为中心的有组织的现代性形式不断地受到多元主义版本的现代性的挑战。这一现代性的多元主义形式强调个体的自律,并以多元选择、企业家策略和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现代性的多元主义形式以自主的自由选择取代社会的掌控理想,个人原则上不再受来自上面的控制,而是受自己主宰。”<sup>[6]28</sup>这种现代性由于缺少普遍规范和强有力组织,必然陷入多元冲突。

瓦格纳的现代性理论虽然没有考虑技术在现代性演变中的作用,但他的现代性理论可以作为公共领域研究的社会学坐标。哈贝马斯认为,17—18世纪在西欧最先出现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公共领域。相对于封建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体化,自由资本主义出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化。市民社会中成长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自由民要求言论和思想自由、私有财产和交换权利,并通过公共领域表达自己的意见。自由主义公共领域是一个介入于国家的集中管理与市民社会的分散的私人生活之间的独立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个人自由地发表意见,形成公共舆论,对国家权力进行约束。现代公共领域的第一次重大转型是向组织化的公共领域转变,在这里,群体和组织取代了个人成为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如出现了商业传媒、国家传媒、政党传媒等。这一公共领域的转型与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相联系,从19世纪末开始到20世纪中叶结束。今天我们正经历从有组织的公共领域到多元主义数字公共领域的转型,在这里,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混杂着各种各样的行为者,既有群体,也有无序的个人,公共领域空间超越了民族国家范围,日益全球化。数字化公共领域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型相联系,也与全球化和数字化相联系。

数字公共领域有着更大的包容性,但问题

是,它是否会导致商谈性品质的下降。今天,网络空间空前繁荣,但充斥着情绪化表达和民粹式操纵,组织化公共领域的瓦解带来的不仅是权力的下沉,也是社会的失序和思想的混乱。如果我们承认公共领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数字化公共领域的出现就是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罗斯托夫采夫曾说:“我们的文明不会持续下去,除非它不是一个阶级的文明,而是一个大众的文明。但最终的问题仍然像一个幽灵,永远存在,永远无情:是否有可能在不降低文明标准和稀释其质量到消失点的情况下,将更高的文明扩展到下层阶级?难道每一个文明一旦渗透到大众就会腐烂吗?”<sup>[7]</sup>公共领域能否逃脱这一命运,这是哈贝马斯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 二、自由主义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sup>[8]</sup>在这里,它被赋予了两方面的意义:作为最先出现在17—18世纪英法等国的特殊现象,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就通过公共性原则为法律和政治秩序奠基合法性而言,它代表着前所未有的新的规范意识。

17—18世纪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诞生经历了两个阶段。最先出现的是文学公共领域,在这里,有产者和市民出于自我教化目的,形成各种阅读和讨论圈。文学公共领域本身没有直接的政治意图,但它蕴含着民主的政治潜能:“在协会内部,人们平等交往,自由讨论,决策依照多数原则。在这些一定程度上还把市民排斥在外的协会中,后来社会的政治平等规范得以贯彻实施。”<sup>[3]</sup>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文学公共领域很快就激进化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当中形成了一种政治意识,针对专制统治,它提出了普遍和抽象的法律概念和要求,最终还认识到应当将公共舆论当作这种法律的唯一合法源泉。”<sup>[9]</sup>在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中,“建立法律的是真理而不是权威(veri-

tas non actoritas facit legem)”<sup>[9]</sup>成了新的合法性原则。

由于其独特的背景和交往条件,自由主义公共领域是一个“小而美”的精英主义公共领域。一方面,公共领域是自由讨论和表达的空间,人们在这里就公共利益和法律和政治原则进行广泛辩论,因此它具有商谈性;另一方面,这一公共领域是排他的,参与者主要是资产者和自由民,平民、劳动者和妇女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这一双重性不是偶然的,它既得益又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学背景和媒介手段。

第一,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为公共领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提供了社会学条件。哈贝马斯说:“在第一批现代宪法中,基本权利条款是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模式的写照。它们保障社会作为私人自律领域。与之相对的是一个功能有限的公共权力机关,而处于二者之间的似乎可说是一个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这些私人作为公民是基于市民社会的需求,按照通过这种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领域来行使统治合理化的观念,而与国家发生关系。”<sup>[9]</sup>公共领域这一介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特殊地位,使公民有可能对公共权力发挥批判和监督作用。

第二,自由主义公共领域既是一个思想空间,也是一个生意的领域,这就为公共领域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报刊、杂志的发行,出版社和书店的营销,本身就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因此资产阶级对公共领域自主性的捍卫,本身就符合经营者的利益。罗伯特·达尔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sup>[10]</sup>中的杜普兰既同情启蒙运动的事业,又把《百科全书》的出版视作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中,书商的贪婪促使他们投机、冒险,但他们在为自己取得最大利益的同时,也为思想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公共传媒的发展虽然并非

都像《百科全书》的出版发行那样惊心动魄,但都得益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条件。

第三,对启蒙时代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来说,人类的解放理想和资产阶级的解放要求之间具有一致性。“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成公众的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sup>[9]59</sup>基于这双重角色的统一,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交流关系,资产阶级也必须捍卫个人在公共领域中的平等权利。

第四,作为单一阶级的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减轻了公共利益的论证重负。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斗争是围绕着王权和国家展开的,涉及的主要是言论思想自由以及生命、财产权等法律权利。社会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关系是由市场体系自发地调节的,因而这一公共领域较容易达成共识。

第五,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虽然本质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在这里,一般工人阶级和贫民是被排斥在外的。但这种排斥不是法律和道德的排斥,而是基于参与者参与公共领域的条件和能力而产生的排斥。参与公共领域不仅需要阅读能力,而且要有一定的闲暇和物质基础,因而贫民和无产者很大程度上就被自动地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这既保证了公共领域的商谈质量,又限制了社会底层人的参与。

总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指向,即自由宪政国家的建立、普遍主义的人权和公民权的法律化、个人自主性理想以及把公共性原则作为一切法律和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原则等等,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它对无产者、妇女、非白种人的参与权的限制都决定了这一公共领域有着致命的缺陷。也就是说,自由公共领域的高质量的商谈性是以牺牲对民众的包容为代价的。这一矛盾就决定着自由主义公共领域是不可持续的,一旦法律、社会和技术条件发生变化的话。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自由公共领域内的阶级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公民权的扩大,它也就陷入

了瓦解,并被新的形式所取代了。

### 三、组织型公共领域

自由主义公共领域是一个脆弱的、不稳定的结构。首先,在规范层面上面临着形式平等和实质不平等的矛盾。宪法赋予每个人以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平等权利,但没有赋予他们平等使用权利的物质条件,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平民、工人阶级和女性基本上被排斥在外,显然,这一结构性限制与公共领域公共性的普遍原则相冲突。其次,随着政治公民权的扩大,工人阶级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必然把贫困、失业、工资等社会问题带入公共领域,从而使自由主义公共领域原先隐蔽的矛盾和冲突暴露出来,从而带来社会的动荡,原先由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现在出现了与之相对抗的平民公共领域。再次,工业化时代出现的贫困化和阶级冲突,要求国家介入社会和经济领域,通过利益再分配和增加就业、稳定经济周期等方式争取选民的支持,人为创造自己的合法性。在此背景下,国家不再是中立的调节者,而成为公共领域的主导力量。同时,一个由阶级利益和权力竞争为结构特征的公共领域中,个人必然被政党、企业和政府边缘化。

进入19世纪后,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走向了衰亡,逐渐被国家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所取代。公共领域的主体是追求自己利益和权利的各种组织,如商业组织、工会、政党和国家等等。一旦组织取代了个人成为公共领域的主体,公共领域也就必然由个体间通过语言交往的横向联合变成了组织对其成员的纵向操纵。因此,哈贝马斯把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公共领域称为“操纵的公共领域”。在这里,“原先,公共性确保公共批判对统治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对统治的实施进行批判监督”<sup>[9]202</sup>,现在变成了国家、政党和大公司对公共舆论的自上而下的控制,“以至于公共性原则再也不能证明统治

的合法性,更谈不上保障其合法性了”<sup>[9]205</sup>。

如果说自由主义公共领域提供了一个规范理想,这一理想的前提条件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严格分离,其中,公共领域由汇聚成公众的私人构成,他们将社会需求传达给国家,随着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公众既失去了私人领域的自主性,也就必然失去公共领域的自主性。在社会与国家一体化的结构中,“公众本身只是偶尔被纳入到这一权力的循环运动之中,而且目的只是为了附和”<sup>[9]201</sup>。公共领域不再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独立领域,也无法发挥独立的批判作用,“批判的公共性遭到操纵的公共性的排挤”<sup>[9]202</sup>。从批判的公共领域到操纵的公共领域有许多表现。

第一,私人的新闻写作到舆论宣传的转变。在自由主义时代,“传播信念的报刊是公众的一个讨论机制,它首先关注的是确立公众的批评功能;因此在投入经营企业的资本时,如果考虑到回报的话,也仅仅是第二位的”<sup>[9]221</sup>,而在国家与社会一体化时代,新闻作者已经由独立的个人变成了雇员,他们更多是以机构名义而不是个人的名义表达其观念。

第二,公共领域的国家化或政党化。在国家与社会一体化时代,绝大多数传媒是由机构拥有的,它们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这里,舆论的公关功能凌驾于它的批判功能之上,舆论的“‘供应商’在准备追随的消费者面前披上了代表型的外装。公共性仿造了过去那种代表型公共领域赋予个人魅力和超自然权威的神圣光环”<sup>[9]230</sup>,哈贝马斯把这种现象称为公共领域的封建化,“公共领域变成了一座宫廷,公众可以瞻仰其所展示出来的声望,但不能对它自身提出批判”<sup>[9]235</sup>。

第三,新的传媒工具的出现为有组织的公共领域提供了条件。自由主义公共领域是文字公共领域、阅读公共领域,而20世纪出现的公共领域是图像的公共领域、观赏的公共领

域,电影、广播和电视成了主要的公共媒体。新媒体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关系,原先的公共领域很大程度上是“围墙内空间”,人们亲历现场,参与公共集会、活动、讨论等等,随着大众媒体的出现,公共领域变得越来越虚拟性、非情境化、匿名化。在这里,具体在场交往和横向交流被远程媒体与观(听)众的纵向关系所取代。虽然媒介形式并不直接决定其内容,但对传播的内容有选择倾向。相对于文字媒体,影视媒体更有利于浅显性内容,不利于深刻的思想的交流;有利于操纵的公共领域,而非批判的公共领域。在此意义上,公共领域失去了商谈性特征,变成了单纯的传输和宣传。具体来说,电视传播的自我操纵结构混淆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概念所表明的:在大众传媒时代,影视作品的生产像工业产品的生产一样受制于商业化逻辑,受制于非交往的工具理性逻辑;文化产品的生产不是依赖批判的公共领域,电视非但没有形成公共领域,反而制造出虚假的共同体。它透过虚拟的方式人为地营造人的亲密关系,使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即受众的观念和情感被操纵化。<sup>[11]</sup>

第四,自由主义公共领域是公众的公共领域,而有组织的公共领域是大众的公共领域。正如米尔斯所指出,在前者中,有许多人作为积极的公众在表达意见和接受意见;公众的交往有着有机的形式,在他们中形成的集体意见能够抵制主导性权威,并要求自己的诉求能够得到有效的回应;权威机构受到限制,其权力不能任意地渗透到公共领域,因而,公众在其行动之中或多或少是自主的。<sup>[9]295-296</sup>反之,在大众的公共领域中,真正的参与者很少,人们之间信息和观念的交流受到显性或隐性的控制,公共领域掌握在媒体组织和它的权威手中,因此,公共意见既失去了影响力,也不再得到有效的回应。

总之,以包容与商谈为标准来衡量,有组织的公共领域同样具有悖论特征。一方面,在

形式上,新的公共领域的包容性有了提高,不仅资产阶级和自由民,而且工人、妇女等群体也可以被纳入到公共领域之中,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再受财产和性别的限制;另一方面,在组织化的公共领域中,在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更多的是消极的大众,而非积极的公众。在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体时代,公共领域呈现为两极化,一方面是操纵公共领域的权威和组织,另一方面是受操纵和灌输的大众消费。这一公共领域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被批评为文化工业,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被诊断为经济系统的金钱和行政系统的权力对生活世界,即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殖民化。

#### 四、混杂多元的公共领域

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开篇说:“哲学由于错失了实现自身的时机曾一度要被废弃,但也因此得以存活下来。”<sup>[12]</sup>在某种意义上,公共领域的理想也是如此。在20世纪80—90年代,公共领域理想曾回光返照。20世纪60年代新社会运动和80—90年代东欧民主化运动一度使哈贝马斯重拾起对公共领域的信心。“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巨变构成了链形事件,它不仅是电视转播的一个历史事件,它自身正是通过电视转播的方式完成的。……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不同,电视使游行民众在广场和街道的真实在场变成无所不在的在场,因此,他们展现了革命力量。”<sup>[3]32</sup>基于这一经验,哈贝马斯对公共概念做了重新理解。在他看来,公共领域虽然受到操纵,但不能完全被收买。只要正式的公共领域(即与立法机构相联系的公共领域)与非正式公共领域(即民间的分散和多元的公共领域)之间还保持着联系,公共领域的民主潜能就不可能被完全窒息。在大众传媒时代,公共领域不必理解为一套正式的制度,也无需以正式的组织形式来组织,在多元、流动、开放的新

公共领域中,公共领域变成了一个内容、观点、意见的多元交往网络,它的信息可以一种特定方式被过滤和综合,也可以围绕特定议题形成某种公共意见,如68运动中出现的女权运动、生态运动、新生活方式运动等。哈贝马斯相信,分散多元的公共领域有助于协商民主理想的实现:“同商议性民主相联系的规范性期待的很大部分,现在落到了意见形成的边缘结构上了。期待的对象现在是觉察和诠释全社会问题,并且以一种既吸引注意力又富有新意的能力。边缘领域要能够满足这种期待,非建制化公共交往网络必须使多多少少自发的意见形成过程成为可能。”<sup>[13]</sup>换言之,在大众媒体时代,公共领域的包容和商谈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新自由资本主义取代国家资本主义以及进入到数字媒体取代广播、电影和电视媒体之后,公共领域陷入新的危机。早在1990年代,哈贝马斯就隐约地感觉到:“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通过电子传媒,事件在全球变得无所不在,不是同时发生的事件也具有了共时性效果。与此同时,差异消失,结构解体等等,都对社会的自我感觉造成了重大后果。……种种情况表明,公共领域的民主潜能具有暧昧性特征。”<sup>[3]32</sup>2021年,他发表了《关于政治公共领域新一轮结构转型的思考和假说》长文,接着又出版了《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和协商政治》,在这些文本中,他对自己原先的乐观主义信念做了反思和修正。他意识到,数字化正在改变公共领域的结构,相对于影视电子传媒,数字公共领域更加包容,但由于其内容缺少过滤和主题化,它更多地呈现出混乱和非理性特征。与影视传媒时代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被少数人和机构主宰相比,数字公共领域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的信息的可及性,少数的信息生产者与多数的消费者之间的二元结构被打破了,手机让每个人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但问题是,数字公共领域的包容空间的扩大并未带来商谈或理性品质的提高,我们再

次面临着包容性与商谈性的矛盾。

第一,从手段上说,数字媒介的出现无疑是全新的现象。它具有去中心化、强互动性特征。但许多学者都意识到,数字媒介的民主化具有暧昧性。福克斯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提供了一套“参与/连接/共享的意识形态”,表面上,数字公共领域是非工具性、非等级化的,参与、连接、共享的公共领域比有组织的公共领域更能创造关爱、共享、情感、授权、连接或创造等积极价值,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所意识到的,在这些社会维度背后运作的是资本积累的工具理性。<sup>[14]</sup>韩炳哲也指出,在当代社交媒体中,人们被困在“数字化的回音室”之中,每天我们都在点赞、评论和互动。<sup>[15]</sup>数字式交往带有悖论特征:虽然无时无刻不在联结,但人与人之间并无真正的关系。数字化使无界联结和即时应答成为可能,但人们之间的交往已经日益流于表面的和琐碎的闲谈和好奇。

第二,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界限的模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起依赖于政治公共领域与家庭私人领域的结构分离。在早期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人们通过书信和日记等私密性文字交流情感,通过文章和书籍等表达对公共事务的意见。在私人领域中,人们通过家庭和与朋友的交往培养自己的自主人格。在公共商谈中,人们从私人视角转向普遍他者视角,就公共利益和普遍性原则与他人展开对话。在这里,“构成公共领域的不是主动还是被动参与商谈的区别,而是服务于共同利益的话题,以及经过专业检验的形式和贡献之合理性,它们使人们能够对共同利益和不同利益有所理解”<sup>[16]60</sup>。虽然数字公共领域呈现出个人主义特征,但并不具有自由公共领域的优势。表面上看,数字公共领域更加透明、更加平等,也更加民主,但人们更多地不是在讨论公共利益和事务,而是展示其隐私和“特立独行”的形象,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消失了,公共领域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自恋性表演的空间。公共领域成为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混合物,一种

非驴非马的半公共性,“这些空间似乎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匿名的亲密感:根据过去的标准,它们既不能被理解为公共的,也不能被理解为私人的,而最有可能被理解为一个膨胀到公共领域之中的领域,这一领域以前只保留给私人信件通信”<sup>[16]62</sup>。

第三,数字化公共领域具有无政府主义特征。“公众在虚拟空间中解体为大量偶然的零散群体,是由特殊利益所维系的”,“在这个虚拟空间中,没有任何功能上的对等结构,可以将去中心化的信息重新聚合起来,对其进行筛选,并以编辑过的形式将其综合”<sup>[16]158</sup>,数字公共领域“众声喧哗”,但缺少过滤和凝聚机制,就如黑格尔所说,公共舆论具有双重性,“不值一顾的是它的具体意识和具体表达,值得重视的是在那具体表达中只是隐隐约约地映现着的本质基础”<sup>[17]</sup>。以往的公共领域,无论在自由主义精英公共领域还是有组织和公共领域中都存在着业余与专家的分工,“技术上和组织上高度复杂的媒体系统需要专业人士,在公民凝结公共意见的交往流中扮演守门人的角色。……这些人士指挥着生产,与组织生产技术和销售的公司一起,构成了公共领域的基础设施,最终决定了公共交往的两个决定性参数——所供应之物的作用范围和协商质量”<sup>[16]39</sup>。但是,数字化公共领域拆除了专家与业余者之间的围栏,也就失去了内容审核和凝聚共识的条件。在自媒体时代,公共领域与其说是严肃讨论的场所,不如说是嘈杂的广场。数字公共领域的商谈质量下降缘于其碎片化和无政府主义化。

第四,数字公共领域表面上是自由开放的、平等的,但技术手段的普及并没有完全消除数字鸿沟和不平等。当数字鸿沟与社会力量的不平等相结合,就不可避免使数字公共领域带有组织化公共领域的封建性和操纵性特征,正如在当今世界中,数据和网络已经被少数公司垄断一样,他们不仅富可敌国,而且成了无冕之王。

最后,数字公共领域不仅导致日常交往的

异化,还助长了政治民粹化和极端化。民粹主义总是奉行唯我独尊,谁不与我在一起,谁就是人民的敌人。网络时代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此意义上,它们之间具有的亲和性,正如有组织的公共领域与操纵性权力、自由主义公共领域与议题的限制之间具有亲和性一样,在它们中间都存在着参与和商谈的悖论。

## 五、结 语

上述对公共领域结构转型及其政治影响的讨论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历史为背景的,但可以作为普遍的形式,运用于其他社会的分析和研究。自由公共领域可以用于表征那些具有高度限制性的精英形式公共领域。这一公共领域不仅在参与者范围上,而且在议题的范围上都存在着限制。参与者范围和议题限制并不是完全是消极的,在限制的同时它也为理性共识创造了条件。正如我们在日常经验中见到的,讨论者在他们擅长和熟悉的内容上就容易达成共识。自由公共领域的解体有其必然性,因为从本质上它的结构和机制是不符合现代性的。无论是否流于表象,现代化既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平等,它不可能允许把一部分成员长期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在此意义上,自由公共领域的消失是合理的遗憾。有组织的公共领域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在大众媒体出现后,社会矛盾和冲突会促使国家和舆论机构运用自己的地位和资源优势去影响公共舆论,或直接下场生产舆论或文化产品,以贯彻自己的意图和目的。工具化的公共领域在特殊的时期有其合理性,即使在自由民主国家对公共领域也有法律限制,并且在特殊的条件下为了社会的安全而牺牲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但是,长期来看,这对公共领域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它破坏了公共领域所需要的自由平等的交往条件。

关于数字公共领域产生的原因和悖论性特征,前面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在这里,我们

同样要放弃简单化的看法,把它的出现视为黑暗中世纪的来临。正如前面谈到的,它部分地消除了精英主义和有组织公共领域的限制,但又产生了自己的问题。由于缺少反思和过滤的机制和组织,数字公共领域中混杂、破碎、流变和自发的意见表达难以产生出社会协调所需要的共识。

我们想强调的是,如果我们承认健全的公共领域是现代民主和文明生活的基础条件,而公共领域历史又没有为包容与商谈的统一提供答案,公共领域对我们来说就始终是一个难题。这一难题可称为“罗斯托夫采夫之问”:公共领域包容性的扩大是否必然降低其品质或质量。这一难题不是西方社会特有的问题,也不是现代性某一阶段或某一形态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是一个贯穿现代性始终的难题。

## 【参考文献】

- [1] 加汉姆. 解放·传媒·现代性——关于传媒和社会理论的讨论[M]. 李岚,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 [2]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曹卫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49.
- [3] 哈贝马斯. 1990年版序言[M] //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曹卫东, 王晓珏, 刘北成, 等,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4] 康德. 判断力批判[M] // 康德全集: 第5卷.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06.
- [5] 哈贝马斯. 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领域——我的两个思想主题的生活历史根源[M] // 赫尔墨斯的口误: 曹卫东学术译文集.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69.
- [6] DIETRICH J. Muslim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a global sociology of modernity[M]. Char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 [7] ROSTOVITZEFF M.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 I: the orient and greece[M]. Trans. DUFF J D. New York: Biblo & Tannen, 1926: 541.
- [8] 哈贝马斯. 初版序言[M] //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曹卫东, 王晓珏, 刘北成, 等,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初版序言, 1.

- [9]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 王晓珏, 刘北成, 等,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10] 达尔顿. 启蒙运动的生意[M]. 叶桐, 顾航,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 [11] 黄圣哲. 电视与公共领域[M]//黄瑞祺. 沟通、批判和实践——哈贝马斯八十论集. 台北: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258.
- [12] 阿多诺. 否定的辩证法[M]. 王晓升,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3: 1.
- [13] 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 童世骏,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443.
- [14] 福克斯. 交往批判理论[M]. 王锦刚,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9: 66.
- [15] 韩炳哲. 他者的消失——当代社会、感知与交际[M]. 吴琼,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88.
- [16] HABERMAS J. Ein neuer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d die deliberative politik [M]. Berlin: Suhrkamp, 2022.
- [17]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 张企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334.

[责任编辑 林雪漫]

## A Cursed Fate? From the Free Public Sphere to the Digital Public Sphere

WANG Xingfu<sup>a,b</sup>

(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Foreign Marxism,

b.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entury,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Western world has undergone three transformations: free public sphere, organized public sphere, and digital public sphere. Today, we are in the third stage. How to view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We can take inclusion, deliberation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as a theoretical coordinate. In terms of inclusion and deliberation, as a free discussion sphere of free and equal individuals, free public sphere has strong feature of rational justification, but it is limited in inclusion and elitist. Workers and women are excluded, issues are limited to the issues of property and individual rights, and its participants are bourgeois and freeman. In the organized public sphere, state institutions and large corporations have replaced individuals as agents, and public opinion and opinions are controlled and manipulated from top to bottom. Although the people are legally granted the universal right to participate, they are actually deprived of the opportunity and means to play active role, so it a weakly inclusive and strongly controlled public sphere. In the era of digital public domain, although more people are given opportunities and means of self-expression, the public sphere is increasingly fragmented and trapped in various conflicts. Digital sphere is filled with irrational emotions and self-performance, so it is a strong inclusive and weak deliberative public domain. If the unity of inclusivity and deliberation is the normative ideal of the public sphere, does the process from the free public sphere to the digital public sphere indicate that the expansion of participation space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a decline in its quality? This is a difficult problem that our era is facing.

**Key words:** free public sphere; organized public sphere; digital public sphere; modernity; Habermas